

老重庆

老重庆志

唐治泽 冯庆豪◎编著



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

壹
与华盛顿 伦敦 莫斯科 齐名的
二战名城 老重庆 老山城

《老重庆影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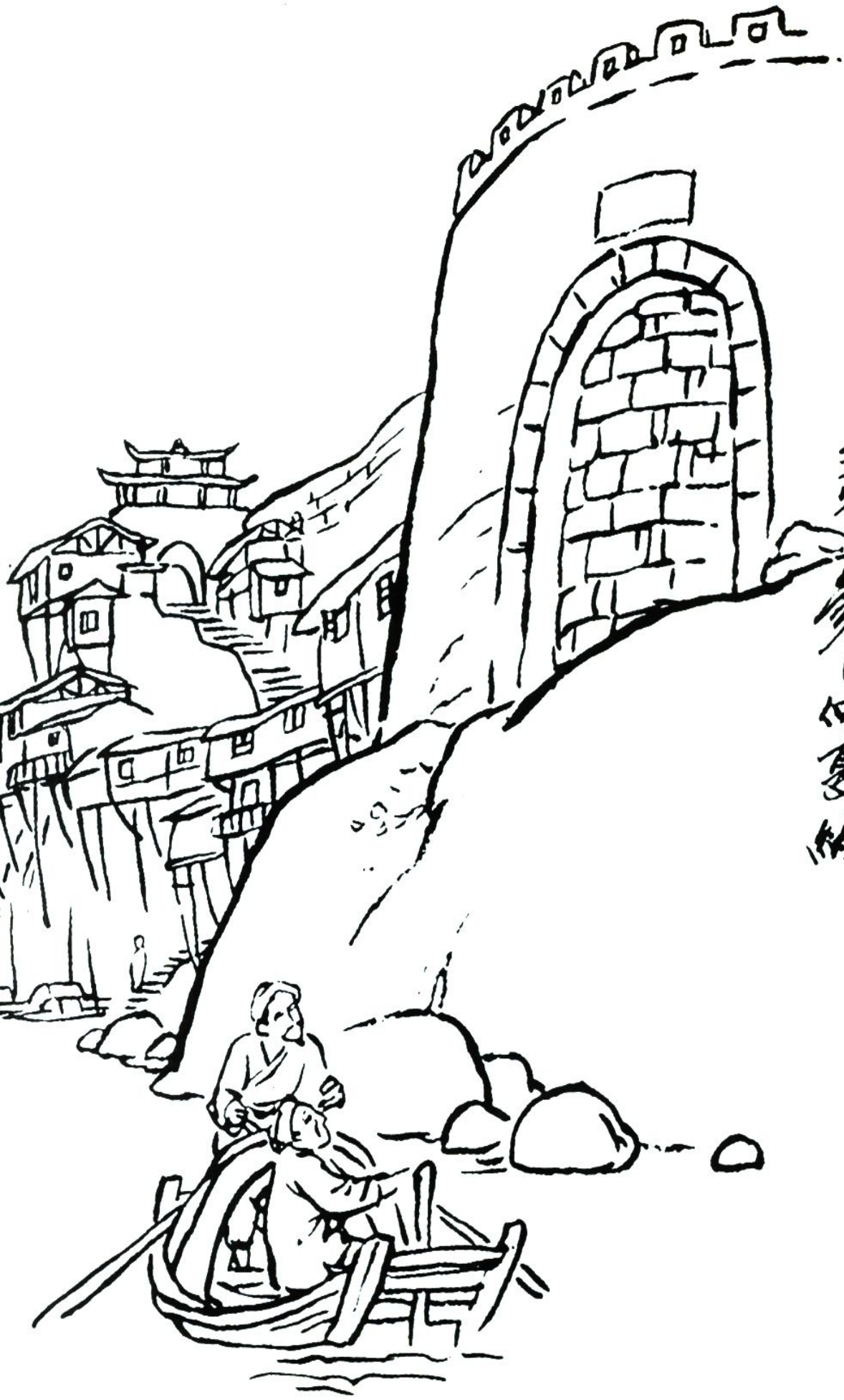


在广袤的巴渝大地上，点点疏星般地散布着上千座老城寨堡。面对这些半圮而风雨斑驳的古道荒城，残缺而一身沧桑的夕阳故垒，遥想那金戈铁马，刀剑交鸣，旌旗蔽日，烽火连天的战场，耳边犹闻昔日鼙鼓；又曾记这烟柳画桥，羌管凤箫，熙攘市井，参差人家的城镇，眼前依稀当年繁华。我们将从这里穿越千年时空，开启尘封往事，寻其迹，考其源，志其事，留其影，以飨读者。

唐治泽 冯庆豪 编著

八門紫洞九門河

五月
仲夏
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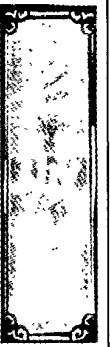


目 录



总 序	1
前 言	4
重庆城建史略	6
『九开八闭』的重庆古城	13
朝天门	15
东水门和翠微门	20
太平门和太安门	27
储奇门和人和门	29
金紫门和凤凰门	32
南纪门和金汤门	34
通远门和定远门	38
临江门和洪崖门	45
千厮门与西水门	50
佛图关	54
历史悠久的巴渝古城	58

皇华城	124
白帝城	119
钓鱼城	107
星罗棋布的古寨城堡	105
黔江古城	102
巫溪古城	98
巫山古城与大昌古城	92
奉节古城	88
云阳古城	83
万州古城	80
忠州古城	77
涪州古城	72
铜梁古城与安居古城	67
合州古城	64
江北古城	58



多功城

126

磐石城

129

天生城

132

龙崖城

134

万寿山寨

138

洮滩寨

142

其他

146

后记

152

总序

《老重庆影像志》

王川平

方面，尤其是对老重庆的个性与嬗变、老重庆的灵性与魂魄、老重庆的根与源，力图以图文并茂的表述引起读者的注意，与读者作寻根之旅。本丛书的作者与编者，都是从事文物、图书、档案、出版、历史和文化研究等方面工作多年的优秀人选，既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又有专门知识方面的学术积累，并尽可能在文字处理上通俗、生动、准确。丛书使用的两千多张历史照片，许多是第一次公开出版，足见其珍贵和罕见。

重庆是一座具有世界历史与文化价值的城市，对于这一点，笔者在主编该丛书及撰写《老房子》的过程中坚信不移。这不是直辖后的文化自大，而是遵循“实史求是”的原则准确对待重庆历史得出的结论，是依据古为今用的原则建设重庆新文化的需要。可惜的是我们总以为自己的文化家底不够厚，其实是我们现时的努力离目标还有较大的距离。令人高兴的是直辖之初，笔者提出把重庆建设成为与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相适应的文化中心的文化建设远期目标，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市民所接受，正在成为这座城市的规划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老重庆影像志》丛书的出版，确实是一件可喜可贺可敬之事。

看着这座古老的城市慢慢长大

尽管重庆直辖才十年，但它却很古老，尽管重庆正以惊世的速度在长高、长壮，但它曾经十分古朴而低矮，尽管重庆一天天在变得靓丽，但它灰蒙蒙而沉甸甸的底色仍存留在记忆之中。当楼房的样式和市民的生活越来越趋于类似的时候，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与城市品质就变得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和宝贵。

历史与现实就是这样复杂，这样磕磕碰碰。重庆的文化人一方面惊讶于这座城市成长的速度，一方面惊讶于在此速度拉动下消逝了的那些值得保留的东西。这种惊讶同样是复杂和美好的，因为他们不因惊讶而停住手脚，停止思考与行动。眼前这套《老重庆影像志》丛书就是他们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老重庆影像志》丛书共十本，分别是《老城门》、《老房子》、《老街巷》、《老码头》、《老地图》、《老广告》、《老档案》、《老行当》、《老风尚》和《老钱票》。它们从不同的视角，管窥这座城市的昨天，内容涉及市政变迁、政治演变、经济发展、市井生活、文脉流传传承等等



千厮門

西水門

朝天門

三門洞

淨寺

龍神祠

朝天馬

朝天觀

玄天宮

西湖池

藏經閣

金碧山

縣文廟

府署

重慶府署

報恩寺

洗墨池

金碧台

小池火

東水門

文德門

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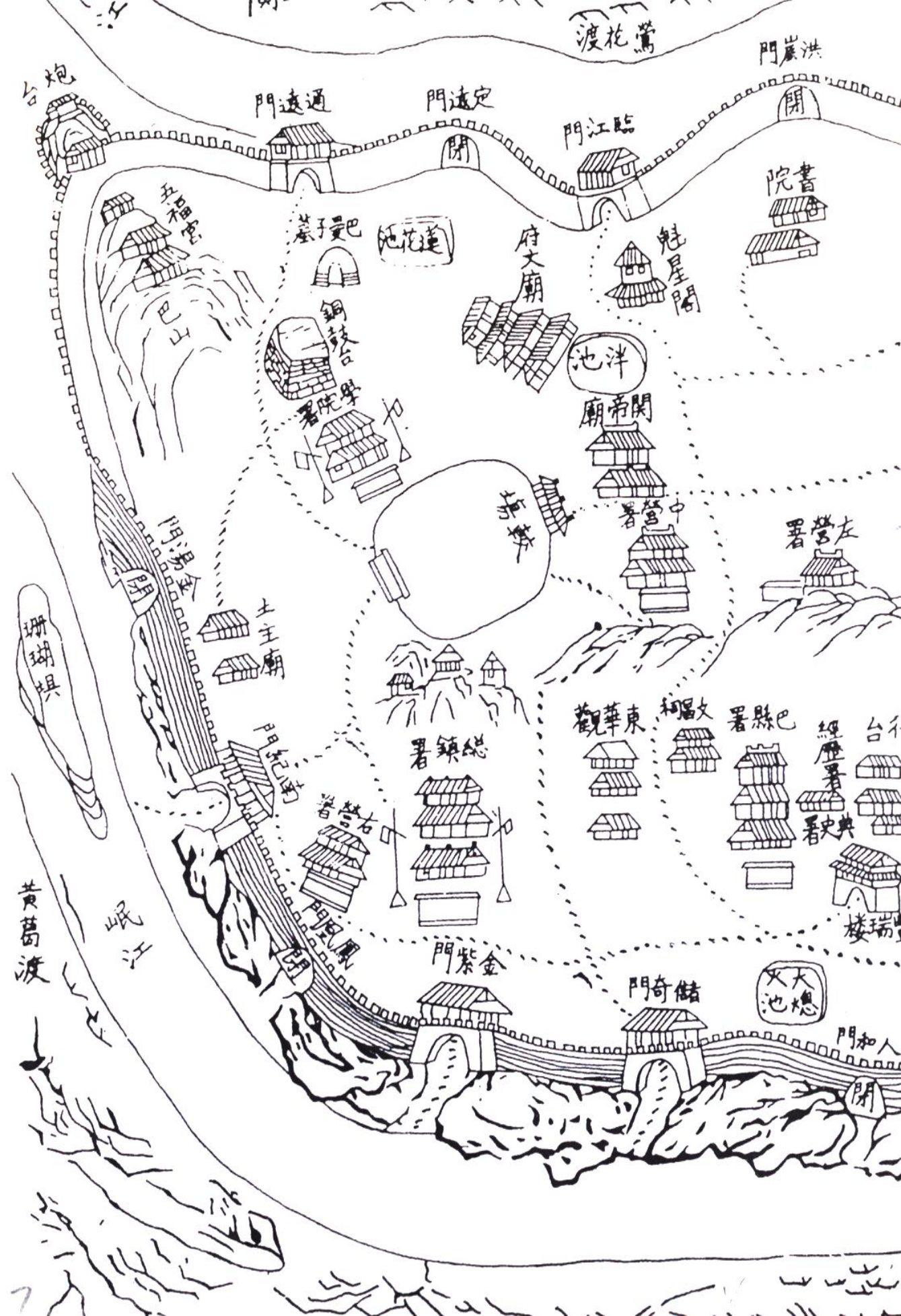
大平門

龍門浩

高王廟

海雲

奎山



渡花鶯

門巖洪

門遠通

門遠定

門江臨

開

台炮

院書

和相宅

墓子晏巴

池花蓮

府文廟

魁星閣

巴山

銅鼓台

署院學

池洋

廟帝關

署營中

署營左

門湯金

土主廟

署軍

珊瑚堤

署鎮總

觀華東

祠福文

署縣巴

經歷署

台行

門紀南

署營右

署鎮總

觀華東

觀華東

署縣巴

署史典

樓瑞

黃葛渡

岷江

門鳳凰

門紫金

觀華東

門奇儲

池總

門和人

開

前言



今约7 000~6 500年前。古城略呈圆形，占地18.7万平方米，四周绕以城垣和护城河。而在距今6 000~4 000年前时，中华大地上涌现出了大批古城，目前仅长江流域就发现十多座，黄河流域更多达四十多座。最大的是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面积有120多万平方米。

西南地区最早的古代城址出现于距今约4 500~4 000年前，基本上都分布在成都平原。如新津宝墩城址、郫县古城乡城址、温江鱼凫城址、都江堰芒城城址、崇州双河城址等，是迄今中国西南地区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史前城址群。但重庆地区却缺乏早期古城遗址，一些有明确记载的古城都未发现其遗迹，如张仪所筑的江州城址。现在这一地区所发现的城址没有早于秦汉时期的，因此这方面的考古研究工作今后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早期城市出现最密集的地方是平原地区。因为这里无险可依，人烟又密集，因此只能筑城以守。古代标准的城邑是四方形，每边一门，共四门。甲骨文有墉字，也是城郭之郭，作，中间四方就像城垣，其上各有一座城楼建筑，十分形象。当然实际城址并非都这么规整，尤其

中国古代所谓的“城”，是指四周有城墙围绕的居民聚居区。中国古代城市与西欧中世纪城市只是作为经济中心不一样，它同时具有区域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军事堡垒的功能，尤其是政治中心的作用突出，因此中国的城市都是政权机关的所在地。城市的大小还与其政治作用的大小成正比，甚至明文规定从天子之国到诸侯之都再到卿大夫采邑的大小比例，让其规模与政权的级别相适应。因此，我们可以从一个城市与当时周围的其他城市规模的比较，就能基本确定它的政治经济地位。这是中国历史考古中的一个常识。

而确定城市大小最简明的标准就是城墙的规模。城墙起源于防御，“城”字最初的字形就是在一个四方城邑旁边立着一只“戈”。早期人们为了防备野兽的侵害和敌人的劫掠，便在居住区四周挖上深壕，引水为池，挖出的土堆筑在壕沟内侧，就成为最早的城墙。因此，作为防御设施的“城”和“池”是同时出现的。

据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址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目前发现的最早城址是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属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距

质为主的寨堡建筑，它们也建有城墙、城门。这类寨堡建筑宋代多称为城，明清则多称为寨，它们一般都不是一级政权驻守之处，或只是避乱性质的短期驻守，而主要是作为抵抗敌人或结寨自保之类的军事设施而修筑的。这些寨堡曾密布四川各地，现在有迹可寻的估计有数千座，但因近代以来基本都废弃不用，所以除少数外，也基本是残破不堪，掩埋在荒草丛中了。本书即以这三种类型的城市和寨堡建筑为标准，分别向大家介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庆老城门。

是丘陵、山区，常是随地赋形，依势而建，所以其城垣之形就有方有圆，并不规则，城门也有多有少，不一定是四门。大致而言，大城门多，小城门少，不过一般最少也不会少于两门，不然就成死胡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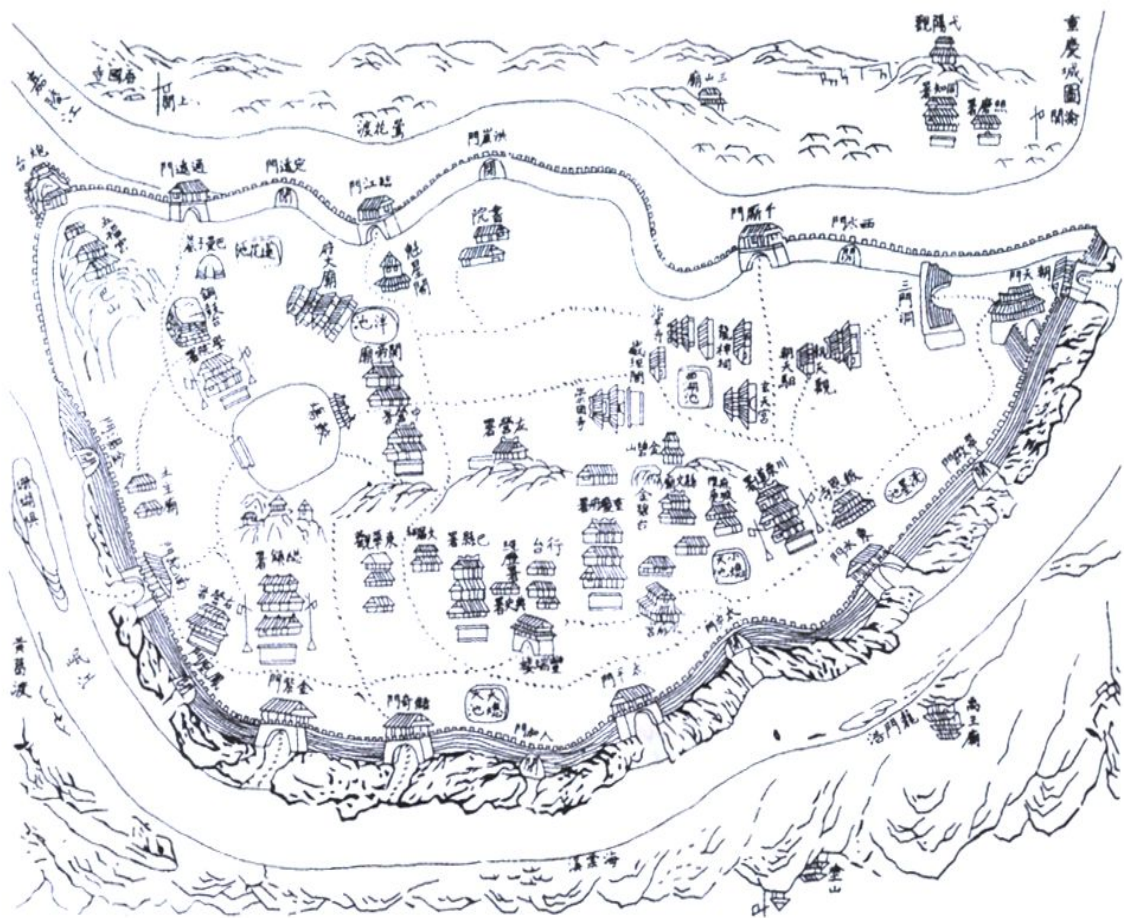
城内的布局也有讲究。重要建筑如宫殿、衙署等大体都建在城市中轴线上，平民居住区和手工业区建在城南，墓葬区常在城北。当然这也是理想的标准布局，现实中谁也不会不顾实际情况而一成不变地完全按此建城，而是较多地考虑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功能需要而因地制宜。

重庆境内因处于低山和丘陵地区，缺少平原，因此其范围内的城市（包括寨堡）建筑都是这样一些随地赋形、因地制宜的布局。这一带的古城遗址，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中心城市，即在本地区内具有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位置和重大作用，曾充当过省级政权机关驻地甚至曾为国都的城市，这只有重庆城可当之。二是中心城市以外，但也同时具有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性质的城市，而且是县级以上政权的驻地（行政中心），重庆境内的各州县可当之。三是纯军事性质或曾以军事性

重庆城建史略

重庆市区及其附近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生息繁衍，近年仅在江北、南岸的沿江一带，就发现近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据史籍记载，重庆初名为巴，为巴国之都；秦灭巴后为巴郡治所，设江州县；后又改名垫江、巴县、楚州、渝州、恭州、重庆等名。作为川东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重地，重庆历来都是郡、道、路、府、州、市的治所所在，历史上还曾三次作过都城（春秋战国时的巴国之都、元末明玉珍政权的大夏国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陪都”），也曾三次被列为直辖市（抗战时期为直隶行政院的特别市、解放初期为中央直辖市、1997年起又成为中国四个直辖市之一），因此从古至今都保持着区域性大城市的地位；从全国范围来看，也大致保持着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

重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地位与重庆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分不开。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四川盆地东部，在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形如半岛，大



清乾隆时重庆城图

西可大二... 门... 另两个... 又在... 城北... 把... 了... 从... 上... 当... 6



清光绪年间的重庆城图

体呈东西向，而尖端向北，东、南临长江，北临嘉陵江，西与陆地相接。从水路入川，重庆是必经之地，自此溯嘉陵江水路北上可至川北各地，向西沿长江经沱江、岷江可达川中、川西直抵成都，从陆路也有大道西至成都，往南也有陆路到达贵州、云南。因此，这里不仅是商业辐辏、物资聚散的水陆码头，更是扼控川东、屏障川西、关系西南的军事重镇。这里自三峡起便山高水急，峡多滩陡，关隘重重，险阻处处，其城又三面临水，一面依山，如果再加上高筑墙，广积粮，端的是金城汤池，易守难攻。即使强悍的蒙古铁骑，也曾被它阻挡达四十年之久而不得寸进，打破了蒙古军想顺江东下直取南宋都城临安的计划，使南宋政权得以偏安一时。下面我们就从此事说起。

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大军攻入四川，成都及其附近州县失陷，遭到大肆烧杀掳掠。这次兵锋虽未及川东，但也促使各地开始加强军事防御设施的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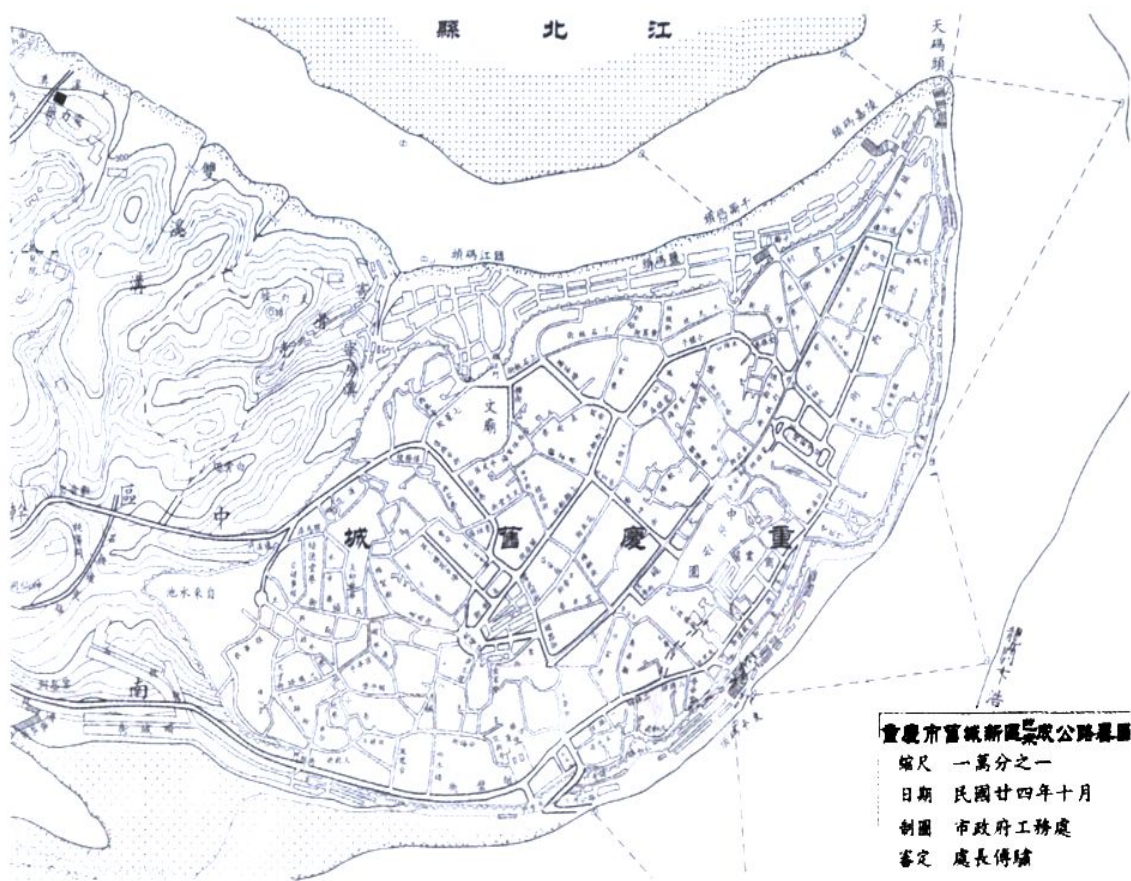
四川历来有两个军事重镇，一是成都，二是重庆。成都建于平原之上，无险可守，自古一攻就破。而重庆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易守难攻。所以，重庆成了战略防御的重点。

约在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彭大雅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此人曾出使过蒙古，深知蒙军特点，因此上任后就开始筹划修筑重庆城垣。有人不同意，顾虑工程浩大，费力费钱。彭大雅说：“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无不可筑之理。”城在嘉熙四年（1240年）基本筑成，至少有四个城门，因为据记载彭在四门立大石，上书：“某年某月彭大雅筑此城，为西蜀之根本。”但在《元史》和《宋史》中，却提到重庆有洪崖、千厮、镇西、熏风、太平五门。

只是有些门的具体位置尚难确定。

彭大雅所筑之城，是在大敌当前时仓促所为，只是在旧有城墙上进行维修并加固加高。其所依之旧城，一般都认为是三国时期李严筑的土城。不过其时距三国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又历经战乱沧桑，其城即使还在，应早已残破不堪，难以依恃。据记载，蒙军曾在南宋嘉熙三年（1239年）下半年两度围攻重庆，而彭大雅是在第二年年初才将城筑好的。史籍记载彭大雅筑城时“披荆棘，冒矢石”，说明其筑城工程确是在边打边筑的情况下完成的。我们很难想象重庆仅依靠新筑的半截子城墙就能抵挡住差不多是攻无不克的蒙古铁骑，所以此事尚有疑问。据分析，彭大雅是在原有版筑土墙外侧复以大砖护墙，并完善了城上军事设施。也就是说，在李严之后，彭大雅之前，应当还有史籍失载的筑城之事。解放初期曾在太平门附近出土一些有“宋淳祐乙巳东（西）窑城砖”字样的宋代城砖，乙巳为淳祐五年（1245年）。这不仅证明彭大雅及其继任者使用了城砖，而且证明宋代城郭至少已延伸到太平门以西了。

因为彭大雅筑城“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督责未免苛严，遂遭言官参劾，谓其“险谲诈变”、“贪黩残忍”，故城成之时，就成了彭大雅削秩罢官之日。但后人对彭大雅筑重庆城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西蜀之地能抗击蒙元大军达四十年之久，彭大雅功不可没。事实也确实如此，蒙元军多次侵入四川，



民国时期重庆城图

西可大
 二街
 門只
 有
 另
 外
 个
 向
 西
 在
 城
 北
 一
 條
 街
 上
 有
 一
 名
 白
 虎
 廟
 其
 本
 上
 就
 是
 在
 此
 處
 也

都在重庆—合州一线受到顽强抵抗而无法前进，甚至蒙哥大汗也战死在合川钓鱼城下。因此彭大雅死后被追谥为“忠烈”，老百姓更是立庙祭祀他。这正是功罪任人评说，天理自在人心。

三国时修筑重庆城的是李严。李严，字正平，汉末南阳人。初为益州牧刘璋将，刘备入川后归之。刘备临死前在白帝城托孤，他是与诸葛亮一起接受顾命的大臣之一，以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白帝城）专事防吴。蜀后主建兴四年（226年）春，李严移驻江州。这时的江州城，大约因人口滋生而显得城小地狭，西汉巴郡太守但望曾说过，郡治江州“地势侧险，皆重屋累居。数有火害，又不相容。结舫水居五百余家”。东汉有一段时间甚至将郡治迁到了北府城（今江北）。再从军事上看，此前的江州城主要建在半岛尖端及长江河谷一侧，陆路易被居高临下攻击，不利防守。所以李严扩大城池，修筑了周围十六里长的城墙。汉代一里的长度，据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为414米，十六里则有6624米。大城主要是向西扩展，把城墙修到了重庆半岛的山脊上。当时可能只有两个城门，一名青龙，一名白虎，从名称看应是东、西二门。另外又在城北储粮之地修了仓城。这基本上就把重庆半岛东半部分的主要险阻地形都包括了进来。不过，这次所筑城墙之遗迹也未在考古调查中发现踪影，故其具体位置还难以确定。

在李严之前约540年，史籍中记载第一个在江州筑城的是战国时期的张仪。张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是战国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据说他是鬼谷先生的弟子，与苏秦是同学，后被秦惠文王用为相，为秦国的崛起立下大功。公元前316年（周慎靓王五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蜀王伐其弟苴侯，苴侯跑到巴国去寻求政治避难，巴王没有能力保护他，于是向秦国求救。秦惠文王派张仪与司马错率军伐蜀。灭蜀后，张仪见巴地富庶，又派兵直取巴国，将巴王俘虏，巴也就此灭亡了。这真是引狼入室的千古教训。

巴亡后，秦在原巴国统治地置巴郡，在原巴都置江州县，为郡治所在。张仪在江州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修筑江州城垣。不过，这件事在史籍中只有四个字的记载，即《华阳国志·巴志》中的“仪城江州”，因此其详情不得而知。但据考古发掘，在半岛尖端一带发现多处战国至西汉的古井、陶器和瓦当，可知这里当时有居民聚居。据有人推测，张仪所筑的城大约在今千厮门一小什字—东水门一线的北面，而且主要部分在山脊之东的长江一侧。

如果再往前推，有关重庆城垣的情况就只有间接的推论了。因为巴国没有可识的文字流传下来，又僻处边远之地，中原典籍极少记其事迹。大家都知道巴蔓子将军的故事：巴国发生内乱，蔓子许楚三城而请楚出兵平乱，事后蔓子拒不与楚城，而以头谢之。这三城不知是何城，但肯定应是近楚的边城。既谓之城，当有城垣。以边城而有城垣，作为巴国国都的江州，又岂能是不设防的城市？不过，当时的巴都（包括张仪城）究竟建在哪里，实际上至今仍未真正弄清。后世有三种说法，一说是建在今重庆半岛上，这是比较流行的看法，但



其中又有认为在半岛尖端一带的，也有说在半岛靠中间一点的，二是认为在今江北嘴，即与半岛尖端相对的嘉陵江北岸，不少专家持此看法，还有一说是在巴县西或西北，见于一些古籍记载。但这些说法都带有相当大的猜测成分在内，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还须今后加强城区考古发掘来证明。

在彭大雅建城之后，还有一次重庆城建史上最大规模的筑城工程，这就是明初戴鼎筑城。据清乾隆年间王尔鉴修《巴县志》记载：“明洪武初，指挥戴鼎因旧址砌石城，高十丈，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环江为池，门十七，九开八闭，象九宫八卦。”根据这段记载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筑城的时间是“明洪武初”。洪武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共有31年，既言“初”，应不出前十年之外，否则就应该说是“洪武中”了。戴鼎的官职为“指挥（使）”，这是军事卫所的最高长官。重庆置卫据《明一统志》记载是在洪武六年，则戴鼎之任也只能在此年之后。因此，其筑城的具体时间，应在洪武六至十年，亦即1373—1377年之间。第二，城是“因旧址”而筑，可见是在原有旧城（应当就是彭大雅所筑之城）基础上加筑，其城市规模应当没什么大的改变。第三，是“砌石城”，可见此前筑城没有用石，最多只是用砖包砌土墙。第四，其城“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据考证明代量地，一尺的长度为0.3265米，则此城周长为8687.2米，与李严所筑城相比，长了2063.2米，也即戴筑城长度是李筑城长度的1.31倍。在几何图形中，圆的周长每增加 n 倍，面积会相应增加 n^2 倍。这就是说，如果城是正圆形的话，“戴城”的面积会是“李城”的1.72倍。当然重庆城不是个正圆，史籍记载与考证的长度也并非十分准确，因此面积的增加不会这么多，但有所增加则是肯定的。据此可以说明由李至戴所筑城



西可大
二能
门只
有要
另西
外个
又城
在门
北一
的把
松其
之左
城清
丁右
登白
城重
从
其
本
上
就
把
重